

214-223

7996(2)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划分^①

李炎贤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100044)

Q981

关键词 划分; ~~旧石器时代晚期~~; 中国 旧石器时代, 晚期;

内 容 提 要

本文作者主张以素材、技术和类型的区分为主要依据, 将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归纳为四个大致平行发展的系列,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明显地具有继承和发展的特点,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形成可能同地质地理条件、技术类型的继承和发展不平衡性有关。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研究是从 20 年代在宁夏灵武水洞沟和内蒙萨拉乌苏河地发现开始的, 解放前发现的可确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地点, 除上述两地外, 尚有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 另外, 在甘肃庆阳、宁夏灵武横山堡、山西西北部和陕西北部也发现一些零星的石制品, 也有人把它们归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解放后, 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发展迅速,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地点发现较多, 据不完全统计, 约有 300 多处, 其中十多处并且被赋予文化名称, 新发现的地点中较为重要的有: 华北地区的河南安阳小南海、山西朔县峙峪、山西沁水下川、河北阳原虎头梁; 东北地区的辽宁海城仙人洞; 南方地区的四川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贵州兴义猫猫洞、普定白岩脚洞、湖北房县樟脑洞等。

发现材料的增加不断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增进了我们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和内涵的了解, 也不断给我们提出思考的问题, 这些发现物是属于单一的技术类型系列还是属于几个不同的技术类型系列? 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从 1983 年起, 我国学者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探讨(张森水, 1983、1987、1988、1990; 黄慰文, 1989; Gai, 1991), 对深入认识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有益的, 但不无遗憾的是: 有的讨论只限于一个地区或一个省, 而未涉及全国; 有的讨论虽涉及全国, 但却把南方置于非常特殊的地位, 而不是和北方的发现同等看待, 甚至所用术语都不同, 使人难于理解它们是否处于同一等级的分析单位, 至于同一等级分析单位而所用术语不同, 使问题复杂化, 则徒增读者负担, 于事无补。

要划分旧石器代文化, 首先要确定划分的标准,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标准, 本文作者认为: 划分旧石器时代文化应以主要的文化遗物的特点、发展和演变为标准, 不同的地区

①收稿日期: 1993-01-08

发现的文化遗物不尽相同，完全照搬其他地区适用的标准来划分本地区文化有时会碰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例如，西欧旧石器时代晚期骨、角器和艺术品发现较多，曾被用来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作进一步的划分；中国发现含骨、角器的地点少，骨、角器虽有一定数量，用来划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还为时过早。至于艺术品更是凤毛麟角，怎能根据它是否存在来作划分？我们希望在每一个地点能够发掘到丰富的各种人工制品，在进行对比和对文化作粗的或细的划分时都能有充分的理由。但工作的结果往往不那么理想，考古发掘获得的资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残缺不全的，因此，从实际出发选择经常发现的、大量的、可对比的资料进行分析，归纳，从而确定各个地区、各个地点的发现物的异同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就成为多数学者在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时的着眼点。根据中国现有的发现情况，本文作者认为：素材、技术和类型是划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比较重要的因素，标本的大小和类型组合只能作为次一级分类的依据。素材包括打片和制器两方面所利用的材料。素材的大小、形状和特点影响到打片方法和修整方法，也关系到加工出来的产品的形状和类型。技术也包括两方面：打片和修整。类型是素材与技术结合的体现。根据这一想法，本文作者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从主要的文化遗物的特点考察，可以归纳为四个主要的大致平行发展的系列。

二

在近十年的出版物中出现了不少关于概括各地发现的文化遗物的名词术语，除了传统使用的文化和工业外，尚有：文化类型、文化变体、文化组合、文化综合体以及文化传统、工业亚型等等。这些名称有些是同义词，只是各人使用的习惯不同而已；有些则存在一定的区别，但各人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为避免误解，在这里不重复使用这些术语，除非在引文中不得不照抄原文。

1. 以石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

这一文化系列以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的发现为代表。这一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包括石片及用石片加工成的石器(约占 80%)和石叶及用石叶加工成的石器(约占 20%)两部分。石片可见到修理台面的痕迹，有形制较规则的三角形石片，另外还有一些两极石片，有修理台面的石核。石片石器的类型有刮削器、端刮器、尖状器和凹缺刮器等，有的标本可同莫斯特的标本相比较。石叶是这一遗址具有特色的标本。石叶制品也是引人注目的器物，主要类型有：刮削器、端刮器和尖状器。由水洞沟遗址还发现有穿孔的鸵鸟蛋皮。在水洞沟附近的一个地点还发现有磨制的骨锥(Boule *et al.*, 1928; 贾兰坡等, 1964; 邱中郎等, 1978)。

过去认为水洞沟的工业“好像处在很发达的莫斯特文化和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之间的半路上，或者是这两个文化的混合”(Breuil, 1928)。根据 1963 年发掘的结果可以进一步把它的时代确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碳十四测年结果也支持我们的推论。至于水洞沟石制品的内涵，我们同意 Breuil 分析的主要部分，对他的一部分分析和结论持保留态度(Li Yanxian, 1991)。

水洞沟工业的另一重要成分——石叶及其制品的起源问题尚不清楚。但我们注意到：在丁村 54:97 地点发现有一件石叶制品(P.0538 号标本：裴文中等, 1958, 图版 XXVII

及 XXVIII : A), 河北阳原板井子也发现有 12 件石叶(李炎贤等, 1991), 旧石器时代早期一些遗址也发现有石叶, 这表明水洞沟的石叶及其制品很可能是在吸收中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的技术类型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 以细石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

在 70 年代以前, 我国北方发现分布很广的以细石核和细石叶的存在为特色的文化遗存, 有些学者据此称之为细石器文化(裴文中, 1947), 其时代通常被归于新石器时代, 或中石器时代, 或旧石器时代晚期(裴文中, 1947、1955、1965), 后一种说法的主要论据为萨拉乌苏河的材料, 原作者并未多加论证, 后人附和者亦甚少。因此人们的印象还是保持细石器是中石器或新石器时代的认识。从 70 年代起, 下川(1970、1971、1976—1978)、虎头梁(1972、1973、1974)、薛关(1979、1980)、柴寺(1977、1985)等遗址的先后发现与发掘、研究以及测年工作的成果逐渐改变了人们以往的看法。

这四个主要遗址的碳十四年代已给出: 柴寺为距今 $26\,450 \pm 590$ 年或大于 40 000 年; 下川下文化层为距今 $36\,200 \pm 1500$ 年, 上文化层约为距今 16 400—23 900 年; 薛关为距今 $13\,550 \pm 150$ 年; 虎头梁为距今 $10\,690 \pm 210$ 年或 $11\,000 \pm 500$ 年(吴汝康等, 1989; 王向前等, 198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 1978、1980; 黎兴国等, 1987; 黄慰文, 1989; Gai, 1991)。虽然上引四个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不尽相同, 还有商讨余地, 似乎可以这样推测: 大约距今二万多年前, 在中国北方已出现了以细石核和细石叶为标志的细石叶工业。它在距今 2—1 万年期间得到很大发展, 其分布区域主要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①, 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细石叶工业仍保持其兴盛的趋势, 且分布区域向南扩展, 达到长江以南。

这一文化系列的主要特征是出产锥状细石核或楔状细石核和细石叶, 伴出的石器则往往是用石片或石叶加工成的, 很少用细石叶加工成的。可以确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含细石叶工业成分的几个遗址的文化内涵不尽相同, 但有下列共同点: 1、细石核、细石叶与石片、石叶共存, 且有相当数量的石器是以石片或石叶为素材的; 2、细石核具有区域性特色, 楔状石核在各个遗址都有一定数量, 而以虎头梁出产的比例为高; 3、石器组合中端刮器的数量引人注目。这四个主要的遗址除了共同点外还各有特色: 襄汾柴寺丁家沟遗址发现有锥状石核、楔状石核、细石叶、石核式刮削器、端刃拇指盖刮削器、修背石刀等; 另外, 同时还发现有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等石器(向前等, 1986)。这一石制品组合的特点是典型的细石叶技术与类型同丁村文化类型的结合, 后者可能是残留成分。故这一遗址的文化遗存似可称为含丁村文化传统的细石叶文化。下川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上、下两层。上文化层属于细石叶文化系列, 据王建等(1978)的报道, 细石核以锥形者为大多数, 楔形者较少, 另外还有一件两极石核; 石器小型者多, 主要类型有石核式刮削器、端刮器、修背石刀, 雕刻器和尖状器等, 也有一些较大的石器, 其中还有砾石和研磨盘。由下川上文化层发现的石制品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1、细小的石制品为数众多; 2、有典型的细石核; 3、石核中锥状细石核居多(约占一半), 楔状细石核约占 11%, 柱状者约 8%; 4、石器中的修背石刀、雕刻器、端刮器大致可以同国外发现的同时期的

^①人类学学报 1988 年第 4 期载: 在四川攀枝花回龙湾发现有细石器和骨角器, 伴出有象、犀、巨羊等 20 多种化石。唯报告尚未发表, 年代亦未测定。录以备考。

标本对比, 具有特色的为石核式刮削器; 5、“石簇”为两面加工, 与虎头梁发现者相似; 6、在工具组合中端刮器占 41%, 居首位, 其次为石核式石器(22%), 再次为边刮器(16%)。虎头梁遗址发现的石核有 279 件, 被分为盘状、两极、楔状(236 件)和柱状; 石器有 364 件, 包括砍砸器、尖状器、端刮器(221 件)、雕刻器和边刮器; 石叶有 300 来件, 石片 40 000 多件, 另外还有穿孔的装饰品 13 件(盖培等, 1977)。在本文作者看来, 虎头梁石制品的特点有三: 1、楔状细石核发达, 其数量在石核中占 84%, 而柱状石核仅 6%, 无锥状石核(原报告未提及); 2、在石器类型中端刮器占有显著地位(60%); 3、在石器中引人注意的是近端一侧加工成凹入状的单肩式尖状器和半月形刮削器, 大致可以同国外一些同时期的标本对比。山西蒲县薛关遗址发现石核 240 件, 石片 4 310 件(包括石叶 110 件), 石器 225 件。石核中除 149 件形状不规则者外, 楔状者 19 件, 半锥状者 10 件, 似锥状者 5 件, 漏斗状者 4 件, 而呈船底形者最多, 计 53 件。石器中端刮器最多(143 件, 占 63%), 刮削器次之(46 件), 尖状器又次之(29 件), 雕刻器、修背石刀和似石斧都为数不多(分别为 4、2、1 件)(王向前等, 1983)。在本文作者看来, 薛关石制品有下列几点是比较突出的: 1、在细石核中船底形石核占一半以上, 而楔状石核和锥状(包括似锥状和半锥状)石核的数量都较少; 2、石器类型中端刮器居首位(63%), 其次为边刮器(20%)、尖状器(12%), 有雕刻器和修背石刀, 但都不多; 3、边刮器中有加工成半月形者, 与虎头梁发现者相似, 尖状器中也有外形近似虎头梁发现者, 唯薛关发现者均单面加工(正向加工), 而虎头梁的半月形边刮器为两面加工, 尖状器单面加工和两面加工的都有。

根据上面的介绍和分析, 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1、这四个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均可归纳到以细石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 它们有共同的特征, 但又各具特色; 2、柴寺的石制品似乎是衔接丁村文化和下川文化的中间环节, 而薛关的石制品则是衔接下川文化和虎头梁文化的中间环节, 虽然它还有自身的特点。

3. 以零台面石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

这一文化系列以含有零台面石片为主要特征, 石器的修整以反向加工为主, 石器类型以用零台面石片作素材反向加工而成的刮削器为主。此外, 在这一文化系列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普通石片、少数两极石片。石器类型除刮削器外, 兼有端刮器、尖状器和砍砸器。雕刻器和凹缺刮器并不发达。这一文化系列是由贵州兴义猫猫洞的发现和认识到的, 当时被命名为猫猫洞文化(曹泽田, 1982)。后来在贵州普定白岩脚洞、穿洞、兴义张口洞、安龙观音洞、兴仁和六枝等地均有所发现(李炎贤等, 1986; 蔡回阳, 1989; 蔡回阳等, 1986)。根据新的发现, 有的学者把它们归纳为猫猫洞文化类型(张森水, 1988)。这一文化系列有一些测年数据: 白岩脚洞第 3 层为距今 $11\,740 \pm 200$ 年(半衰期为 5 570 年)或 $12\,080 \pm 200$ 年(半衰期为 5 730 年), 第 5 层为 $14\,220 \pm 200$ 年(半衰期为 5 570 年)或 $14\,630 \pm 200$ 年(半衰期为 5 730 年), 推测上部堆积(第 3—7 层)约形成于距今 12 000—15 000 年或 16 000 年前左右。猫猫洞为距今 $14\,600 \pm 1\,200$ 年(铀系法)或距今 $8\,820 \pm 130$ 年(碳十四法)。穿洞上文化带为距今 $8\,080 \pm 100$ 年(第 3 层)和 $8\,670 \pm 100$ 年(第 4 层)。若根据现有的测年数据, 归于这一文化系列的三个有代表性的地点的时代顺序似乎是: 白岩脚洞较早, 猫猫洞较晚, 穿洞上文化带大致和猫猫洞时代相当或稍晚。结合其他地点的资料, 似乎可以推测: 这一文化系列大致发展于距今 16 000 多年前到距今 10 000 年前, 它

可能形成于较早的时期。象其它系列一样，这一文化系列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依然延续存在。

4. 以石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

这一文化系列发现最多，分布最广。其主要特征为：以各种石片为主，工具主要以石片加工而成，没有石叶工艺和细石叶工艺制品，也没有零台面石片及其加工产品。虽然在大量石片中可以找到一些标本按形状和长宽比例可归到石叶或细石叶中，但缺乏相应的石核和细石核，而且它们同前两个文化系列中发现者有一定区别。这一文化系列因为分布的地域广，各地的地质地理条件不尽相同，因而常出现一些差异，有的学者据此而命名了一些新的文化，他们依据的差异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标本的大小，二是砾石石器含量的多少。在本文作者看来，这两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把它们当作划分文化系列的依据则理由不太充分，至多可作为次一级划分考虑。

在这一文化系列中，有一些地点具有测年数据，现罗列几个较为重要者如下：辽宁海城小孤山第3层下部为距今 $40\ 000 \pm 3\ 500$ 年(热释光法)、资阳人B地点第6层为距今 $37\ 400 \pm 3\ 000$ 到 $39\ 300 \pm 2\ 500$ 年，内蒙萨拉乌苏河大沟湾地点为距今 $35\ 340 \pm 1\ 900$ 年(碳十四法；若依铀系法则为距今 $37\ 000 - 50\ 000$ 年)、云南呈贡龙潭山第2地点为距今 $30\ 500 \pm 800$ 年)、山西朔县峙峪地点为距今 $28\ 954 \pm 1\ 500$ 年、四川铜梁张二塘为距今 $21\ 550 \pm 310$ 年或 $25\ 450 \pm 850$ 年、贵州桐梓马鞍山地点为距今 $15\ 100 \pm 1\ 500$ 年、湖北房县樟脑洞地点为距今 $13\ 490 \pm 150$ 年、河南安阳小南海地点为距今 $11\ 000 \pm 500$ 至 $24\ 100 \pm 500$ 年、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下窖为距今 $18\ 340 \pm 410$ 年或大于 $32\ 500$ 年(热释光法)(以上数据均转引自《中国远古人类》)。尽管这一文化系列的地点发现不少，石制品也发现不少，甚至还发现一定数量的骨、角器，但要对这一庞大的文化系列作进一步的划分，无论在断代问题和技术类型问题上都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三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进一步讨论下列几个问题。

1.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系列间的关系

从1983年起在中国学者中开始的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划分的讨论，注意到了各地发现物的异同，但在归纳时缺乏全面的标准，划分的等级和所用名词术语不大一致，因而出现同一地点的材料在不同学者的论文中归属于不同的系列的情况；对各个文化系列间的关系注意不够，或把次要的因素当作主要的因素来看待，也是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

本文作者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各文化系列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有一定联系的。石片文化系列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主体，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它在石叶文化系列和细石叶文化系列中仍有重要的作用；而零台面石片文化系列可能是石片文化传统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它可能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水城硝

灰洞的发现^①，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李炎贤，1984)。石叶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遗址和许家窑遗址都有所发现，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北京人遗址、黔西观音洞遗址、阳原小长梁遗址也有少数标本可归到石叶一类，虽然还未发现相应的石核，但可以推测：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叶文化系列是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技术类型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在这一文化系列中还可以看到一些两极石片，也是这方面的一个证据。联系到石片文化系列中的小南海工业里不少两极石片存在的事实，从另一方面又补充了这两个文化系列间的关系。

细石叶文化系列引人注目的是细石核、细石叶和加工精致的石器，但还有相当数量的石片、石叶以及用石片和石叶加工成的石器却常常被人忽视了。细石叶技术的起源问题是值得探索的，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一些地点已发现有一些石核具有类似细石叶的剥片痕迹(李炎贤等，1986；卫奇，1985)，这可能暗示细石叶起源于较早的时期，但当时石核上的这类痕迹是偶而产生的而不是系统产生的。到目前为止起源问题还不清楚，有待进一步工作和深入探讨。近年我国学者对石叶文化系列同细石叶文化系列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对认识问题不无好处。张森水(1990)主张，“一般说来长石片工业是细石器工业的祖型”，并把它们归并在一起，称为“长石片—细石器工业”。盖培不同意张森水的说法，认为细石叶不仅仅是石叶的细化，石叶和细石叶的剥片技术明显不同，石叶和细石叶在石核修理技术上也很不同，石叶和细石叶间不存在承传关系。他提出另一种假说，认为细石核的祖先可以在华北一些文化组合中观察到(Gai,1991)。本文作者看来，根据长宽比例，石叶和细石叶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又有明显的区别，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把它们看作是祖裔关系而有人又持另一种看法的原因所在。本文作者主张，从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现的情况看来，石叶文化系列和细石叶文化系列是平行发展的而不是先后继承发展的。从测年数据看来，水洞沟遗址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 $16\ 760 \pm 210$ 年(动物化石)或 $25\ 450 \pm 800$ 年(结核)，而铀系法对同层出土的动物化石测出的年代为距今 $38\ 000 \pm 2\ 000$ 年和 $34\ 000 \pm 2\ 000$ 年，对照一下四个归于细石叶文化系列的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从距今 $10\ 690 \pm 210$ 年到距今 $26\ 450 \pm 590$ 年或大于 4 万年)，可以说双方的年代数据都在一个相当大的变异范围内，很难说哪一个最可信，最接近真实，因而也无法确定这两个文化系列哪一个早，所以要确定哪一个为祖型是不可能的。从另一方面看，石叶和细石叶都有悠久的历史，它们平行发展并非由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开始，而是在较早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不过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分别发展成为文化系列。

2. 技术类型的继承和发展问题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多样的，从技术类型的角度来看，包含着继承和发展两方面。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明显地继承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在技术类型方面的成就和特点，居主导地位的石片文化系列和大量普通石片的普遍存在早已为大多数学者注意到，由此而进一步提出来的石片文化传统之说也为一些学者所推崇，这些事实，众所周知，无庸细赘。兹补充如下几点：

^①水城硝灰洞原测定年代为距今 $57\ 000 \pm 10000$ 年(铀系法)，据沈冠军近年报道，水城硝灰洞堆积的年代比以前的说法为早，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如果这样，则零台面石片就可能更有古远的历史。

(1) 砸击技术 这是北京人石制品中具有特色的技术之一。从前有学者认为这一技术在北京人之后衰落了, 现在看来这样的说法应作修改。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片文化系列中常常可见到两极石片, 如峙峪、萨拉乌苏河大沟湾、汉源、小南海、海城小孤山、齐齐哈尔昂昂溪、青海小柴达木湖、房县樟脑洞遗址等。零台面石片文化系列的白岩脚洞、石叶文化系列的水洞沟、细石叶文化系列的下川、虎头梁遗址都发现有两极石片, 可见砸击技术在中国虽然开始得相当早, 在小长梁(尤玉柱, 1983)、东谷坨(卫奇, 1985)和巫山大庙(李炎贤, 1991)已有这种技术的实物证据; 到了北京人时期这种技术使用极为广泛, 而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 有一些地点仍然使用(如许家窑), 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种技术并未绝迹, 个别地点还大量地采用, 而发现两极石片的地点比以前不仅多而且分布广。

(2) 观音洞(贵州黔西)的石器修整技术具有一定特色(李炎贤, 1983; 李炎贤等, 1986)。在四川、贵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遗址发现的石制品中有一些标本呈现出相当强烈的观音洞技术传统的特点(李宜民等, 1981; 吴茂霖等, 1983; 李炎贤, 1988), 以至贾兰坡和黄慰文提出观音洞—铜梁传统一说(Jia et al., 1985)。

(3) 具有莫斯特技术特点的石器过去在中国发现较少, 现在已知除水洞沟外, 云南呈贡龙潭山第二地点(邱中郎等, 1985)和路南(裴文中等, 1961)也发现有这类标本, 说明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南方和北方都还有一些地区继续使用这种技术。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莫斯特技术的起源问题, 过去有过外来说, 根据近年来的发现与研究, 我们认为这种加工技术在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和板井子发现的标本中已明显地可以看出来了(李炎贤等, 1991; 李炎贤, 1992; Li, 1991)。

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类型因素有二:

(1) 零台面石片 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也有人认为是早期)的水城硝灰洞已发现有这种石片(曹泽田, 1978), 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种石片在西南地区得到充分发展, 并形成一种文化系列。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领域, 这一技术类型因素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和重视。

(2) 石叶 尽管这一类型的标本在旧石器时代中期, 乃至偶而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可以找到, 但作为一种固定的系统的技术类型成份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发展的技术应是细石叶技术, 它似乎是在距今 2 万年前左右发展起来的一种打片技术, 但已相当成熟, 可能这种技术的起源比现在已知的年代还要早。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发展起来的石制品类型主要有: 锥状细石核(下川、薛关、柴寺)、楔状细石核(下川、薛关、虎头梁、柴寺)、细石叶(广见于细石叶文化系列各地点)、半月形刮削器(虎头梁、薛关)、以零台面石片为素材反向加工的刮削器(白岩脚洞、猫猫洞)、短身端刮器(下川)、长身端刮器(水洞沟、下川)、石核式石器(下川)、修背石刀(下川、薛关)、带肩尖状器(虎头梁)、凹底尖状器(虎头梁)、边缘修整的雕刻器(下川)等。

由上所述可见,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叶工业继承性是明显的, 而这时期的发展和创新表现在技术和类型上也是很突出的。新的技术类型因素主要同石叶文化系列和细石叶文化系列相联系。对旧石器时代晚期新发展的技术类型成份, 我们认为本地区旧石器时

代文化发展的结果。从世界范围看来，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大多数地区发现的文化遗物都具有继承性和发展性，同时也具有共同性和地区性共存的特点。因此，在不同国家，甚至相隔很远的地区都可能找到相同的或近似的石制品或其他文化遗物，对此种现象张森水(1990)认为，“可以理解为处于相当发展阶段的古人类可以创造出类似的器物，因此，不一定看作是交流的产物”(P.327—328)。这是有理由的，但是我们并不排斥地区交流的可能性，不过要论证这一命题还要依赖更多的发现和研究，把一系列时间和空间的缺环连接起来，才能说出个头绪来；现有的发现和研究还是比较孤立的，零星的资料的解说，可以用它们来说明一种趋同现象，也可以把它们作为地区交流的例证，两种解释似乎同样有一定理由，但又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

3.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形成的原因问题

通过上面简略的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多样的、复杂的。国内学者大多承认这一客观事实，但对其成因则有不同的解释。本文作者认为有两种因素可能在形成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过程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一是地质地理条件，二是技术类型的继承和发展不平衡。

前一因素可以举四个例子来说明。贵州西部和西南部不乏扁平的砾石，为零台面石片的生产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四川汉源富林遗址附近出产的燧石多小(大小如拳者居多)且节理发育，不易打下较大的适用的石片来，所以这里发现的石制品多为小的，内蒙古萨拉乌苏河大沟湾遗址附近缺乏较大的石料，所以这里出产的石制品也是以小的为多数，四川铜梁张二塘遗址附近的砾石多为粗大的石英岩砾石，这种原料既粗又硬，不易打下细小的适用的石片，所以这一遗址发现的石片多粗大，加工亦受原料影响，而这一遗址发现的砾石石器较多，都同这一因素有关，不同的地质地理条件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生存条件，影响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原料对石制品的技术和类型的选择、表现和发展起着颇为重要的作用，而原料只不过是地质地理条件之一。

技术类型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般说来，继承多了，发展就少；反之，发展多了，继承就少。我们把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归纳为四个文化系列，主要是依据素材、技术和类型的差别而得出的。石叶技术和细石叶技术的分布区同时也是石片技术的分布区，在不同地区有不同技术平行发展，可能说明当时已有技术类型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在同一小的地区或同一遗址，可能有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不同阶段的产物，而这些则有时被孤立起来，当作不同技术同时并用的结果。

同一现象，在不同作者看来，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要很好地说清楚这个时期石制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成因，并不是很简单容易的事情，还要多做工作。本文里提到的两个因素，只不过是根据现有材料和研究成果提出来的一种看法，将来更多的发现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也许证明实际的原因比现在的推论要复杂得多，或者是相反，情况比现在的推论要简单得多，只是我们把问题看得过于复杂了，不管怎样，本文作者都表示欢迎。

本课题(课题号 920402)得到中国科学院特别支持费的资助，特此致谢。

参 考 文 献

- 卫奇, 1985. 东谷垞旧石器初步观察. 人类学学报, 4(4): 289—300.
- 王建等, 1978. 下川文化. 考古学报, (3): 259—288.
- 王向前等, 1983. 山西蒲县薛关细石器. 人类学学报, 2(2): 162—171.
- 尤玉柱, 1983. 河北小长梁旧石器遗址的新材料及其时代问题. 史前研究, (1): 46—50.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 1978. 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之(五). 考古, (4): 280—287.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 1980. 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之(七). 考古, (4): 372—377.
- 李宜民、张森水, 1981. 铜梁旧石器文化之研究.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4): 359—371.
- 李炎贤, 1983. 观音洞文化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中的地位. 史前研究, (2): 12—18.
- 李炎贤, 1984. 关于石片台面的分类. 人类学学报, 3(3): 253—258.
- 李炎贤, 1988. 观音洞文化及其技术传统. 《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 102—109. 文物出版社, 北京.
- 李炎贤, 1991. 巫山猿人遗址的石制品. 《巫山猿人遗址》, 20—23. 海洋出版社, 北京.
- 李炎贤, 1992. 关于丁村石制品的技术和类型. 1992年大连古脊椎动物学会年会上的报告.
- 李炎贤、蔡回阳, 1986a. 贵州白岩脚洞石器的第二步加工. 江汉考古, (2): 56—64.
- 李炎贤、蔡回阳, 1986b. 白岩脚洞石器类型的研究. 人类学学报, 5(4): 317—324.
- 李炎贤、文本亨, 1986. 观音洞. 文物出版社, 北京.
- 李炎贤等, 1991. 河北阳原板井子石制品的初步研究.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参加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大会论文集, 74—9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
- 向前、占扬, 1986. 襄汾县荣寺村细石器地点.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 92. 文物出版社, 北京.
- 张森水, 1983. 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若干问题. 人类学学报, 2(3): 218—230.
- 张森水, 1987. 中国旧石器文化.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天津.
- 张森水, 1988. 贵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若干问题. 《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 119—126. 文物出版社, 北京.
- 张森水, 1990. 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 人类学学报, 9(4): 322—334.
- 吴茂霖等, 1983. 贵州省旧石器新发现. 人类学学报, 2(4): 320—330.
- 吴汝康等, 1989. 中国远古人类.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邱中郎、李炎贤, 1978. 二十六年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古人类论文集》, 43—66.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邱中郎等, 1985. 昆明呈贡龙潭山第2地点的人化石和旧石器. 人类学学报, 4(3): 233—241.
- 贾兰坡等, 1964. 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新材料.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8(1): 75—83.
- 贾兰坡等, 1974. 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 39—58.
- 盖培、卫奇, 1977. 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5(4): 287—300.
- 黄慰文, 1989.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中国远古人类》, 220—244.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曹泽田, 1978. 贵州水城硝灰洞旧石器文化遗址.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6(1): 68—72.
- 曹泽田, 1982. 猫猫洞旧石器之研究.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20(2): 155—164.
- 蔡回阳, 1989. 贵州普定白岩脚洞石片的初步研究. 人类学学报, 8(4): 335—342.
- 蔡回阳、王新金, 1986. 贵州旧石器地点简录. 贵州省博物馆馆刊, 1986年第1期.
- 裴文中, 1947. 中国细石器文化概说. 燕京学报, 33: 1—6.
- 裴文中, 1955.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 科学通报, (1): 30—45.
- 裴文中, 1965.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附中石器时代. 日本の考古学, I: 221—232.

- 裴文中、张森水, 1985, 中国猿人石器研究,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裴文中、周明镇, 1961, 云南宜良发现之旧石器,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2: 139—142。
- 裴文中等, 1958, 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蔡兴国等, 1987, ^{14}C 年代测定报告(PV) I, 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 碳十四专集, 16—38, 地质出版社, 北京。
- Boule, M. *et al.*, 1928. Le Paleolithique de la Chine. *Archives de l'Institut de Paleontologie Humaine*, Mém. 4. Masson, Paris.
- Gai, Pei, 1991. Microblade tradition around the northern Pacific rim: A Chinese perspec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XIII INQUA by the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Academia Sinica, 21—31. Beij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 Jia, Lanpo and Huang Weiwen, 1985. The late Palaeolithic of China. In: *Palaeoanthropology and Palaeolithic Archae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11—223. Eds. Wu Rukang and J.W. Olsen, Academic Press, Orlando.
- Li, Yanxian, 1991. Levallois-Mousterian technique of Palaeolithic industries in North China. Abstracts of the XIII INQUA, p. 200. Beijing.

ON THE DIVISION OF THE UPPER PALAEOLITHIC INDUSTRIES OF CHINA

Li Yanxian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Academia Sinica, Beijing 100044)

Key words Division; Upper Palaeolithic;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author pays attention to that the blank, technology and type of the stone artifacts play a leading role in determining and grouping the industrial patterns in China. Based on this idea, the Upper Palaeolithic industries of China can be grouped into four principal series of more or less parallel development, i.e. blade series, microblade series, flake with null platform series and flake proper one.

In view of technology and typology, the stone industries of Upper Palaeolithic of China comprise both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simultaneously.

The emergence of the polymorphism and complexity of the Upper Palaeolithic industries of China may relate to the geological-geographical condition and the unbalance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n technology and typology.